常州发展与改革在实践中的启示

（1986年 3月）

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都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，既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客观基础，又受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。因此，我主要联系常州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实践来谈这个问题，同大家一起研究探讨。

一、常州市概况

常州，春秋时代称为延陵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。她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中部，交通发达，物产丰富，自古就是江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。 1983年3月起，实行市领导县体制，辖武进、金坛、溧阳3县。全市总面积4211平方公里，人口307万人，其中市区面积94平方公里，人口52万人，平均每平方公里5531人，是全国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。

常州是一个传统的纺织和手工业城市。解放前，民族工商业已有一定基础。江苏有三个被誉为“纺织大王”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民族工商业者，南通的张謇，无锡的荣德生，常州的刘国钧。1949 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是 7200 万元，其中轻纺工业产值 6703 万元，占 93.1% 。民族工商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基础。今天的常州仍然保持了轻型结构的特点，最终产品多是她的优势之一。

由于常州不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，中央和省属的大型国营企业很少，她的工业结构是地方企业多、中小企业多、集体企业多。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下，其灵活性较多，地方政府管理经济自主权比较大。市委、市政府可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，充分利用原有基础，合理地重新组合，积极地加以改造，不断地挖掘潜力，发挥优势，转化劣势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三多”就成为她的又一个优势。

常州地处全国经济最发达的沪宁地带，受到上海的强大辐射，可以大量地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。常州同无锡、苏州是“三胞胎”，各方面条件差不多，她们相互感应，相互促进，共同前进。除了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条件外，常州还有一批土生土长、从工厂里出来的干部。他们熟悉且懂得生产，商品经济意识较强，善于把党的政策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。这也是常州经济能够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到 1985 年，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115.9 亿元，其中工业总产值 104.4 亿元；国民收入达到 44 亿元，都在 1980 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。财政收入和工业实现税利分

别达到 10.04 亿元和 15 亿元，比 1980 年分别增长 49.9%和 87.5%。其中市区工业总产值达 57 亿元，财政收入达到 7.07 亿元，分别比 1980 年增长 69.6% 和 28.5%。市区平均每人每年创工业产值 11300 元，创财政收入 1366 元，创国民收入 3149 元。市区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27000 元。从 1952—1985 年，市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0.8%，翻了六番多；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10.6%，翻了近五番；累计上缴给国家财政收入 90 亿元，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拨款的 8 倍多，为 1985 年末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 5 倍多。

二、常州经济发展过程的三个主要时期

我们分析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划分发展阶段时，不是以政治运动和计划的时间序列来划分的，而是以一定的量和质的变化作为标志的，这样更切合实际，以揭示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。

1952 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，常州的经济发展大体上是这样的：

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，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，生产关系起了变化，使我们能够对原有民族工业进行调整改组，从而把生产力释放出来，形成了常州第一次经济大发展。这个时期被称为“改造——发展”时期。

在这个时期，常州充分利用原有民族工业的基础，依

靠纺织工业这个“母体”发展地方经济。经过调整改组，把全市470多家企业合并为300多家。其中112家染织、针织厂合并为35家，使分散的互不联系的私人工厂能够相对集中，充实加强，有目标地发展。对轻纺工业实行了重点扶持的政策。“一五”期间，全民工业企业增加的职工中，轻纺工业占83%；新增固定资产2000多万元，改善了生产条件，扩大了生产能力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到1957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达2.59亿元，比1952年增长33%。其中轻纺工业产值达到1亿元；财政收入4845万元，比1952年增长94%，比同期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近两倍。依靠轻纺工业的基础，为发展其他工业门类积累了资金，提供了干部和技术力量，从这个“母体”中分裂出新的“细胞”。在大办工业中，从轻纺系统中调出上千名技术员、技术工人、管理干部和大量的设备，办了许多新厂，加强和发展了冶金、电子、化学、医药、建材等新的工业门类，初步形成了现在常州工业的雏形。可以这样说，常州整个电子工业、化学工业、机械工业、建材工业、医药工业等基本上都是在轻纺工业的基础上“裂变”出来的。大办卫星厂，一厂变多厂，好比母鸡下蛋、滚雪球一样，越变越多，越滚越大。

本来这一时期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，但在“大跃进”“左”的错误影响下，由于瞎指挥造成了失误，加上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，使这一发展的好势头受到挫折，被迫进入了调整时期。

20世纪6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这一

时期主要通过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。常州的工业在原来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又一次大的调整改组，对生产力的配置进行重新组合。常州组织了各种形式的“一条龙”，提高了工业的组织程度，依靠技术进步开发新产品，提高产品质量，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。我们称这个时期为“调整——发展”时期。

从1961—1963年，常州贯彻“八字方针”，不是消极地“关停并转”、“搞一刀切”，而是慎重取舍，保留了新发展起来的骨干企业。当时有个口号：只要有产品就会有“户口”，有“户口”就有“粮油关系”。在困难的时候，这些骨干企业通过各种办法“找米下锅”，机械工业、甚至纺织厂的机修车间抓住大庆油田需要大量阀门的机遇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为石油会战生产阀门，从而使自己渡过了难关。还利用中央许多工业部门在调整下马时期到下边来“收编工厂”的机会，争取同中央部委挂钩，把自己的产品纳入部管产品，把工厂归口到部。与此同时，常州还发展了各种形式的“一条龙”协作生产的方式，提高工业组织程度。调整中，常州一批具有活力的集体企业有了很大发展（有的是从全民企业中转出去的）。到1965年，全市工业企业从1960年底的420个减少到365个，其中全民企业从220个减少到118个，而集体企业却从200个增加到247个；全民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由52.38%下降到33.15%，集体企业的比重由47.62%上升到69.38%。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被保留了下来，如柴油机厂、拖拉机厂、变压器厂、化工厂、林机厂、无线电厂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等，后来大都成了常州工业的支柱。经过 3 年调整，工业内部的关系初步理顺，为工业发展增强了后劲，在后来充分表现出来，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。到 1965 年，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 5.35 亿元，财政收入达到 1.26 亿元，分别比 1957 年增长 1.1 倍和 1.6 倍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大灾难，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。但是，全国各个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。在这一时期，常州的经济仍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。到 1978 年，常州经济在量上的增长是很大的，全市工业总产值达 25.76 亿元，比 1965 年增长 3.8 倍，比 1957 年增长 8.9 倍；财政收入达 5.13 亿元，比 1965 年增长 3.1 倍；比 1957 年增长 9.6 倍。在质的方面也起了重大变化。首先是轻工业开始协调发展，1978 年轻重工业产值比例为 44.9 比 55.1，以后基本一直保持在 50 比 50 的水平上。其次是工业组织程度提高，灯芯绒等九个“一条龙”，不仅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，而且为以后企业群体等更高层次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。再次是产品质量提高、品种迅速增加。1975 年常州产品已达 2722 种，比 1965 年翻了一番，比 1957 年增加了 4.7 倍，出现了一大批支撑常州工业的“拳头产品”、“台柱产品”。名牌优质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覆盖率，而且打入了国际市场，灯芯绒、柴油机在我国同类出口产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这个时期的工业布局、结构形式是今天常州工业的骨架。

当然，这些成绩不能归结为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、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结果，而是有其自身的原因的。其一，调

整形成的经济发展的后劲仍在继续起作用。其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常州“乱得晚、治得早”。1966 年，运动开始后，主要还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中的“红卫兵”在闹。当时常州没有大学，外来学生闹不起来，工厂是稳定的。后来张春桥、王洪文搞了“安亭事件”，1967 年，“1·26”夺权以后，开始从工厂里闹起来，常州才大乱起来的。一乱起来就很厉害，两派武斗打死了不少人，很快就通过军管把混乱的局面控制住了，而且以后没有再“翻烧饼”。这段时间不长，虽然有些所谓“脱产闹革命”的，但是工厂都较快恢复了稳定。其三，常州有个重要特点，基层和中层干部大都是土生土长的，他们很少有所谓的“历史问题”，从群众中来的，大家都清楚，所以受政治冲击要少一点、弱一点。在乱的时候，只要不被打倒都能坚守岗位。批“资反路线”一过去，大多数就“解放”了，一出来就按以前那一套已经习惯了的方法去抓生产，出现领导真空的时间短。其四，全国都在打内战，生产普遍大幅度下降，各类产品的缺口都很大，原料、电力供应又不十分紧张，常州利用调整后的基础努力发展生产。1974 年，“四人帮”中的姚文元要找个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典型，选中了常州，要省、市总结写篇文章，在《红旗》上发表。文章写好了，用飞机送往北京，姚文元看后批了“唯生产力论”五个大字，压下来未登。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常州当时的状况。所以，常州地方企业多、中小企业多、集体企业多、指令性计划少，使她不得不依靠自己找食吃，依靠发展求得生存；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全国

出现的权力真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又为她的发展提供了机遇。人家不干，她在大干，在这时期还上了一批新项目，如石油化工、自行车、塑料编织等等。常州经济又跨上了一个新的阶梯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期。党的改革、开放政策给常州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，特别是实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来，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持续稳定协调的新时期。虽然这还只是开始，但改革、开放已经成为其主要特征，所以把这个时期称为“改革一发展”时期。

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农民的积极性高涨起来，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崛起，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，农村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，并向着生产的深度和广度推进。以武进县 1985 年的统计数字为例，全县乡镇企业达到 3386 家；农村劳动力务工、从事个体经商和个体运输的劳动力近 30 万人，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1/4；全县工业总产值达到 33.3 亿元，其中乡镇企业达 23.5 亿元，占 70.57%；全县工业实现税利 6.41 亿元，其中乡镇企业达 2.84 亿元，占 44.31%。可见，乡镇工业已经成为全县经济的支柱。农村改革推动了城市改革，城市改革又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。横向经济联合不断深入，市属企业对数以千计的乡镇企业，在技术上帮助，在物质上相互支援，在管理上促进，在销售上联营，有的已经成为企业群体和其他形式经济联合体中的成员，城乡经济开始走上共同繁荣的道路。农村经济在

全市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， 1985 年，乡镇工业的产值和实现税利，分别占全市总数的 33%和 36%；市区和 3 县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，已由 1980 年的 61 比 39 发展到 1985 年的 51 比 49。

常州自从 1982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后，城市改革也取得了进展，使各方面发生了变化。

1. 企业自我积累、自我发展的能力有提高。 1985 年与 1982年相比，市区全民工业企业职工增加 11.3%，固定资产原值增长 38%，而工业总产值增长 42%，劳动生产率提高 27.5%，税利增长 50%，改革促进了企业内部机制的改善。

2. 在近几年相继建立了工业品、农副产品、生产资料等贸易中心，技术、资金、劳务等各种市场正在逐步形成，市区商业零售网点发展到 13780 个。改变了投资结构，近几年用于交通、通讯、公用事业等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占全市总投资的 29.3%，城市综合功能有所改善。

3. 横向经济联合迅速发展。在“一条龙”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企业群体，是以名优新产品为中心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领域的经济联合体。 1985 年 56 个群体的工业总产值和税利分别占全市总数的 32.86%和 40%。农村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发展到 3100 多个，商品率已达 85%以上。 1985 年，外贸收购额达 6.79 亿元，比 1980 年增长 66.1%，平均每年递增 10.7%，年创汇 2 亿美元，

与外资合营的企业也有了良好的开端，并与全国 120 多个地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。

4. 科技进步加快。“六五”期间完成的工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项目，分别比“五五”期间增长 1.5 倍和 5.5 倍。总共完成 991 个技术改造项目，这些项目每年可新增产值 22.1 亿元，新增税利 2.77 亿元。全市的工业优质品率稳步上升，1985 年达到 14.2%，市区达到 20.5%，接近上海的水平。还与全国 180 多个大专院校、科研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，采取联合研制、有偿转让、获利分成等办法，每年这些单位均有 1000 多个科技成果、技术服务项目可供常州选择。

5. 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的能力有所加强。财政、银行、税务等部门的同志改革意识较强，相互之间比较协调，许多按杠杠规定办不到的事情，单独一个部门办不到的事情，在市长的统一协调下，能够共同研究解决，灵活地调节经济活动。如财政与金融进行“松紧配合”，财政松，信贷紧，就鼓励企业多还贷；信贷松，财政紧，则要求企业多上交财政。为了鼓励发展名优产品和新产品，税收、信贷、财政部门制订了一些优惠办法。1985 年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相互配合，适度调控，保证了企业生产资金的需要。此外，在利用价差、放宽政策方面，也都采取了一些较灵活的措施，这些都为搞活企业从外部创造了条件。

6. 人民群众的生活显著改善。1985 年城市职工平均收入 1214 元，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 824 元，比 1980 年增

长97.1%，平均每年增长14.5%。农村住户人均年纯收入618元，比1980年增长1.1倍，平均每年增长15.8%。城乡储蓄由1.63亿元增加到6.73亿元，比1980年增长3.1倍。城市居民住房面积人均达到5.8平方米，比1980增加48.7%。

城市的改革还在深入发展，主要有两个方面。一是深化企业的改革，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，在企业内部继续深化领导制度、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，建立、完善企业内部的行为机制；推动发展股份化企业集团和租赁、承包制。二是配合企业的内部改革，相应实行政府管理经济职能转换，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要求，政府各部门都在分解自己现行的职责，分清哪些是基本职责，未来也是必须具备的；哪些是过渡职责，以后要逐步取消的。围绕职能转换的要求改革管理机构，调整行政建制。这些已初步形成了方案，1986年开始逐步实施。

三、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在实践中的启示

（一）经济发展的战略观念

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全国宏观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，受其指导，同时也受其制约，还受天时地理环境的影响，加之基础条件的差异和动态变化的机遇，都直接关系着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社会效益，这就出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。常州的经济发展战略，在实践中形成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了这样一些观念。

1.不脱离原有基础，在原有的基础上滚动发展——派生出许多新的生长点，在新的生长点里滚动取得新发展——又派生出新生长点……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。过去往往有这样的情况，一讲发展，就认为是铺摊子、上项目、争投资，把注意力放在新建、外延方面。在今天的条件下，我们的经济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，并不是一切都要从零开始，这里有个投入产出的观念问题。常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依靠“轻纺工业”这个母体的资金、技术、厂房、设备和劳动力来办其他工业，20世纪60—70年代得到较大发展，以至直到今天。她发展的路子不是单靠新上大项目，靠国家大规模增加投资扩大建设规模来实现的，而是靠在发展中不断改组联合，依靠技术进步，形成新的生产力，从而培植出新的生长点，以有限的投入求得较好的总体效益的产生。

这一观念现在已成为多数人的自觉习惯。经济发展是这样，社会事业也是先搞点基础，然后在逐步扩大。建筑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，有了一些基础，争取国家投资和利用外部条件就产生了吸引力，上项目就快，就能获得投资少、周期短、效益好的效果。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这种办法，上了许多新项目。例如冶修、客车、林机、玻璃钢、树脂等工厂，都是和中央工业部门联合搞起来的，地方拿出一些工厂包括设备、厂房、劳动力，用“部长基金”办起来的，成为现在的部属企业。还有些工厂是由于产品适销对路，国家又需要，吸引和争取了省和部的投资

发展起来的。这些工厂中有绝缘材料、柴油机、拖拉机、灯芯绒、电讯电机、小石化等。现在这些工厂无论是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，都是地方的骨干企业。也有些企业是和外贸结合发展起来的。不管哪种形式，都是由于地方有了相当量的投入和基础，被部、省选中，才得到了发展，滚大了“雪球”。横向联合也是这样。没有基础，无法同对方联合；没有辐射力，也没有吸引力。新产品发展离不开母体，吸收新的科研成果也离不开基础条件，否则无力消化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。在原有基础上的滚动发展，有利于地方经济形成特色，比盲目追求门类齐全、具有规模好。事实上一个地区的经济不可能门类齐全。一个地区的经济有特色，才能有发展。商品经济，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特征就是专业分工，专业性越强，地方经济的特色越鲜明，在市场上才能有较强的竞争力。

2. 优化结构出效益的观念。经济结构，包括与市场要求相适应的产品结构，也包括支持产业的技术结构、企业组织结构和所有制形式结构等等，使一定范围内的各产业、行业和各生产要素能够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，实现比较理想的组合，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。

常州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快，与其经济结构比较合理是分不开的。以轻型的加工工业为主，最终产品多；为了适应市场竞争，新产品、名牌产品和优质产品发展较快，占的比例也较高。与此相反，如果一个地区的工厂，或者这家工厂的产品是孤零零的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联系，其经济效益是不会好的。利用一个“母体”发展成一个儿孙满

堂的“系族”，不断地组合新技术，产品向前延伸，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。这种方法有利于产品扩散、技术辐射，更有利于老企业的挖潜更新。商品经济本来就是无孔不入、相互渗透的，只要市场需要，企业有条件，就应该积极地发展，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受行业的限制，打破泾渭分明的行业界限。纺织可以搞服装，重工业可以搞轻工业，只要市场需要，企业能赚钱就行。

经济发展是处在动态变化中的，每发展一次会产生一定量和质的变化，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、改组、改造，重新组合配置生产力，使其结构趋向优化，获得结构型的效益。以 1984 年为例，常州市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提供产值 345 元，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.1 倍；提供税利 57 元，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3.3 倍；每名职工创造的工业产值和税利，分别是 24000 元和 3700 元，为全国的 2.2 倍和 3.1 倍。

现在产品结构最大的弊端是“老面孔不变样”、“单一化大批量。”全国 4700 万吨钢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，一方面紧缺，一方面积压。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品种规格不对路，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如建筑材料，抽水马桶一弄就坏，高级宾馆的钢门、钢窗全都是进口的，国产的几乎没有。连自行车用的钢材也要进口，国产的要加一道改制的工序才能用。炼铁不炼钢，炼钢不轧材，材又不对路，能耗大，成本高，层层设序，物流不畅。这样的结构，谈何效益。凡大企业集中的地区，经济效益都不太好，“大而全”、“围墙高”。现代化的企业，自然经济的生

产方式，投入大，产出小，这是生产力结构的问题。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适合地区特点的经济结构，有一个结构型效益的观念和战略目标。

3. 发展横向经济联合。常州工业指令性计划少，原材料多是在市场上获得的。1984 年，常州通过协作输入的物资中，煤炭相当于同期计划的 86.4%，钢材相当于 81.3%，有色金属相当于 1.5 倍，木材相当于 23%，水泥相当于 50%。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中 80% 靠协进，生产的产品 70%销往外地。不搞横向联合就不能发展。

最早的横向联合可以追溯到 60 年代初。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，发展了“一条龙”。灯芯绒“一条龙”，就是为了提高质量、增加品种第一个搞起来的。生产协作，效果显著。1961 年成立，到 1963 年，入库一等品率就从 53.4% 提高到 90.1%，品种从 51 种发展到 71 种，年产量从 1058 万米增加到 1524 万米，出口量从 50 万米剧增到 236 万米。1985 年达到了 35539 万米，出口 2897 万米。1958 年至 1983 年共出口 3.23 亿米，为国家创造外汇 5.6 亿美元，远销欧、美的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后来，又搞了拖拉机、玻璃钢等 8 条“龙”。“群龙飞舞”，把常州的工业组织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到了新的高度。

以后，在“一条龙”的基础上又演变发展成企业群体，提高了社会化生产的组织程度。如“金狮”自行车企业群体的生产企业已遍布六省市的 29 个市、县。林业机械厂生产的装载机，是银牌产品，10 万元 1 台。原来年

生产能力为 300 台，国家要求生产 1000 台。1000 台就是 1 个亿的产值，但是国家只给一条装配线和检测中心的投资，其他的都不给。这个工厂就把零部件扩散出去，到安徽、苏北、无锡、江阴、武进等地组织了 14 家工厂，都是乡镇企业，和他们联合。搞了一个章程，把各自的责、权、利规定好。允许协作厂到林机厂聘三个人：一个副厂长、一个技术员、一个检验员。各协作厂都要与总装厂生产 1000 台的要求同步提供零部件，利益均沾。总厂腾出厂房，集中人员搞好关键零部件生产及检测和总装。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上 1000 台的。一个厂带了一批厂，一个产品带了一串产品，共同把蛋糕做大，然后再来共分蛋糕。

商品经济要求拆除“城墙”，打破条块分割、城乡分割。企业和企业之间既是伙伴，又是竞争对手，都是平等的法人，不是上下级关系。它们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，优势和劣势的关系，在竞争中靠“先进”、“实力”地位的辐射力，吸引对方参加联合，共同发展。市领导县以后，行政和政治领导都不成问题，下级服从上级；城乡关系在经济上就不行了，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。市里的公司不能按行政层次领导县的工厂，只能通过横向联合，形成网络（工业经济、商业流通、通讯交通、科技、信息等网络）。城市要向农村辐射，才能产生吸引力，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，都要面向农村，城乡一体化。城市是经济的载体，没有城乡的联合，就没有城市的地位。发展商品经济是没有地区、行业、领域之间的疆界的，它的联合是相互选择

的。一个经济区的范围有多大，取决于它的经济、技术、信息的辐射力。政府不是靠行政办法去限制或者凑合，而是利用调节手段，调节各方面利益，发展横向的经济联合。“围墙”经济、“城堡”经济的观念、地区保护主义思想必须打破，让企业自由选择，自主联合。要搞开放的地区战略，保持地方经济的特色，就要坚持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，发展横向联合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。

（二）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，“借才生财”的观念

常州的教育基础比较差，科研力量不足，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想了许多办法，最主要的就是坚持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，所谓“天南海北请财神”、“借才生财”。在知识分子被诬蔑为“臭老九”的年代，常州就开始引进人才。仅 1977—1981 年，全市就从外地引进工程技术人员 1277 人。人事、公安、粮食、劳动部门互相配合。凡是从外地引进的工程技术人员，只要人事部门决定了，公安局报户口，粮食局解决粮油关系，劳动局负责安排引进技术人员的家属、子女就业。人事部门的同志还经常到大专院校跑，争取多分配一些大学生。1984 年，除计划内分配来常的 288 名大专毕业生以外，还争取到 112 名计划外的大学生。

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，就同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搞了各种形式的协作，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，至 1981 年，同全国 140 多家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了钩，吸收科研成果连同技术力量一同带进来了。仅 1981 年，全市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